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後期資助項目

揚雄《方言》用字研究

On the Characters in Yang Xiong's
Fangyan

○ 王彩琴 著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後期資助重大項目
高等學校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專項基金項目
《方言》與兩漢語言研究叢書 主編 華學誠

河南省社科規劃項目

揚雄《方言》用字研究

Yangxiong Fangyan Yongzi Yanjiu

○王彩琴 著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揚雄《方言》用字研究 / 王彩琴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8

(《方言》與兩漢語言研究 / 華學誠主編)

ISBN 978-7-04-027019-8

I. ①揚… II. ①王… III. ①方言—古文字—研究②方言—古詞
語—研究 IV. ①H121 ②H13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1) 第 081807 號

策劃編輯 王 麗
責任校對 金 輝

責任編輯 王 麗
責任印制 劉思涵

封面設計 張 志

版式設計 王 瑩

出版發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區德外大街4號
郵政編碼 100120
印 刷 北京人衛印刷廠
開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張 15.25
字 數 270千字
插 頁 2
購書熱線 010-58581118

諮詢電話 400-810-0598
網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網上訂購 <http://www.landracom.com>
<http://www.landracom.com.cn>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38.00圓

本書如有缺頁、倒頁、脫頁等質量問題, 請到所購圖書銷售部門聯繫調換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物 料 號 27019-00

總 序

哲學社會科學是探索人類社會和精神世界奧秘、揭示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是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水準，體現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狀態和文明素質，其研究能力和科研成果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繁榮發展的哲學社會科學，就沒有文化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就沒有真正強大的國家。

黨中央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事業。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就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推進學科體系、學術觀點、科研方法創新，鼓勵哲學社會科學界為黨和人民事業發揮思想庫作用，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和優秀人才走向世界。”黨中央在新時期對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提出的新任務、新要求，為哲學社會科學的進一步繁榮發展指明了方向，開闢了廣闊前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大力提高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品質，努力構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人才密集，力量雄厚，學科齊全，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主力軍。長期以來，廣大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獻身科學，甘於寂寞，刻苦鑽研，無私奉獻，開拓創新，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服務黨和政府的決策，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為培養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做出了重要貢獻。本世紀頭二十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面臨著難

得的發展機遇。我們要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寬廣的世界眼光，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社會科學的指導地位，認清形勢，明確任務，振奮精神，銳意創新，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揮思想庫作用，進一步推進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是一項光榮而神聖的社會事業，是一種繁重而複雜的創造性勞動。精品源於艱辛，品質在於創新。高品質的學術成果離不開嚴謹的科學態度，離不開辛勤的勞動，離不開創新。樹立嚴謹而不保守，活躍而不輕浮，銳意創新而不嘩眾取寵，追求真理而不追名逐利的良好學風，是繁榮發展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保障。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必須營造有利於學者潛心學問、勇於創新的學術氛圍，必須樹立良好的學風。為此，自2006年始，教育部實施了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後期資助項目計劃，旨在鼓勵高校教師潛心學術，厚積薄發，勇於理論創新，推出精品力作。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同志欣然為後期資助項目題字“厚積薄發”，並篆刻同名印章一枚，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先生亦為此題字“生也有涯，學無止境”，此舉充分體現了他們對繁榮發展高校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高度重視、深切勉勵和由衷期望。

展望未來，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譜寫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宏偉目標和崇高使命，呼喚著每一位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熱情和智慧。讓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求真務實，與時俱進，以優異成績開創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新局面。

教育部社會科學司

序 一

華學誠教授的《〈方言〉與兩漢語言研究叢書》即將出版，囑我爲之作序，我難以推辭，祇是因爲我對華學誠教授《揚雄方言校釋匯證》的熟悉和我對他研究思路的瞭解；但是任務接下來又覺得完成起來有很大的難度，這是因爲自己對《叢書》涉及的十分廣泛的內容，學習得實在不夠，說不好反而有損《叢書》的價值。好在華學誠教授自己另有書序，對這套叢書寫作的緣起、編輯的宗旨、主要的內容，都已經作了詳細的介紹，不需要我來重複，我可以說一點有關但是題外的話。

兩漢與周秦一脈相承，是中國文獻典籍大量產生的文化繁榮時代。秦火之後，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極端政策下，儒家經典的復原與傳承也盛極一時。經今古文之爭激發了各種經史典籍與文字訓詁專書的產生，值得研究的文獻衆多。但是在衆多文獻中，歷來被關注、被作爲主流文化的代表作，值得現代人去整理與還原、研讀與鑽研、發現與挖掘的典籍，爲數並不很多。經過歷史長河的沖刷淘汰，能够在浩如煙海的典籍中凸顯出來的文獻，必然有它們更大的值得珍視的價值。有人喜歡在塵封的書堆的最底層去挖掘資源，就“稀”與“奇”而言，這當然也會有一定的收穫；但是，將那些被歷史珍視、早已留在世間的珍貴文獻整理清楚、研究透徹，應當是歷史研究者與文獻整理者更重要的任務。這種研究的難度和它們的價值一樣，都是因爲它們太被關注，歷代研究成果太多，再想有創新之作非常困難。祇有拋開完全功利的動機，真正理解它們的價值，才會在新的起點上邁開步伐，深究其精妙而有所創獲。

《說文》、《爾雅》、《釋名》、《方言》，是歷代研究者公認的四部最著名的文

字訓詁專書，這四部書，就是我所說的在大浪淘沙中被凸顯出來的“小學”專書。在這四部專書中，《說文》、《爾雅》已有大量研究成果，雖然在一些關鍵地方尚有未得要領之處，但被關注的程度是非常高的。《釋名》在20世紀中葉曾被否定，近20年來人們才重新認識了它的價值，現在的關注度也很高了。《方言》一直沒有人敢于否定，但就研究成果而言，相對偏少，起碼在數量上不及《說文》、《爾雅》豐厚。我想，原因大約有兩個：一個是由於記音工具的不完備，古代方言研究難度太大；一個是方言詞彙涉及口語太多，又有一些新造字的摻入，文獻的書證難以尋求，沒有深厚的積累，想要對清代以前的研究有所突破，實為不易。華學誠教授以20多年的不間斷努力，在錢繹的《方言箋疏》與周祖謨先生的《方言校箋》的基礎上，完成了《揚雄方言校釋匯證》一書。《匯證》使用了6種影宋本、覆刻本、影抄本和重刊本，並且把作為底本的《四部叢刊》本與國家圖書館所藏李孟傳刻本逐字作了復核。其中藏園覆刻宋慶元本卷十三末有“湖北黃岡陶子麟刊”八字，由此知此本即陶子麟覆刻本，另外還有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影宋抄本，這兩個本子周祖謨先生作《校箋》時尚未見到。同時還使用了明清以來的刊本、抄本、叢書本和校注本，包括各種條校條釋的割記，共34種，僅明本就有12種，包括清人誤認為是宋代曹毅之本而實際上是明代正德己巳年的抄宋本。王念孫手校明本《方言》第一次得到使用。這部書搜集徵引了關涉《方言》的各家校注，重點參考的大家就有十多位，對散見於其他著作或者筆記文集的零星闡釋也儘量挖掘，而且不僅僅是客觀的徵引，是對歷代學者的校注本作了系統清理，並對“校”、“釋”上所存在的疑難問題做了積極探索。這些疑難問題，有些是前人已經注意到而沒有一致意見的，有些是作者首次發疑的。我在這裏介紹這部書，是因為它是這套叢書的前提，為這套叢書的編寫提出了一個研究思想，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可靠的研究底本。從這裏，我想說一說自己對這套叢書研究思路的理解，算是學習的體會吧！

漢代在漢語史上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漢語文獻中雙音結構激增，有些已經凝合成詞。這就意味著，漢語單音孳生造詞的階段已近尾聲，合成造詞即將成為主要的構詞方式。因此，形聲造字的速度比之周秦大大降低。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引用了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的奏摺：“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宜，文章爾雅，訓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可見當時極端復古書面語書寫的詔令律書，連小官吏都看不懂了，政府不得不叫各個郡縣挑選一批青年人，送到京城培訓後執職“文學掌故”。胡適因此認為文言在西漢，已經脫離了口語，成為“死文字”。胡適的判斷是否準確姑且不說，因為小吏讀不懂詔令律書，與當時公文復古的文風也有一定的關係，但是漢代語言正在發生著大的變化，這是毋庸置疑

的。漢語一直在口語與書面語兩個軌道上分別發展，口語的發展由於資料缺乏難以全面描寫，書面語也就是文獻語言的文言也是有發展的。兩個軌道不可能完全是永不相交的平行線，也常有交軌，相互的影響隨處可見。在漢語史的研究中，僅僅關注書面文獻的標準語，對有些問題的認識會有局限。尤其是研究漢代的文獻語言，應當考慮到在語言的自然變革中，口語對書面語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是方言俗語不知不覺地流進書面文獻。司馬遷的《史記》由於採用了各種民間傳說和野史，語言風格的變化就很明顯。

《方言》的各種疏證，都在鉤稽方俗口語詞彙在文獻中的用例，正是啟發我們進一步認識《方言》中的方言詞彙對漢代書面語言特別是詞彙研究的重要價值。所以，這套叢書將《方言》與漢代語言研究聯繫在一起，研究者的旨趣是讓人信服的。

從口語中將方言詞彙記錄下來，必須通過漢字。而記錄標準語的漢字派這種用場之後，就顯得捉襟見肘，不大够用。漢字的準確表音機制很弱，記錄方音必須借助方音轉語字；所以，清理這些詞彙的先期工作必須先整理其中的漢字，整理漢字又必須涉及語音，而歷史方音要一個一個地域地弄清。在這套叢書裏，《揚雄〈方言〉用字研究》就是實施這項計劃的漢字整理基礎，《秦漢時期楚方言區文獻的語音研究》就是這項工作方音整理的試點。我國古代的許多專書都有理論證實的價值，但是很少用通論的形式表現；所以，研究古代專書，替古人立言特別重要，祇有從書的體例和散見的表述中提煉出作者的研究理性，才能啟動一部書在現代的應用價值。《叢書》中《揚雄〈方言〉校釋論稿》的第一章，是從《方言》體例中對潛理論的挖掘，也是這部叢書的思想指南。其他幾部著作，一類是對揚雄學術思想的歸納；另一類就是直接進入主題結合《方言》來研究漢代語言特別是詞彙的了。《叢書》的設計有條不紊，可以看到主編研究思路的明確、清晰。

從接到任務就開始陸陸續續地看這套書，書卷浩瀚，不能在短期內細讀甚至無法卒讀，僅够談談感想，也未必得其要領。無論如何，這套叢書給人在研究思路上的啟示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不論是《方言》的研究、漢代語言的研究還是《方言》與漢代語言結合的研究，都還留有相當的空間，殷切希望主編和作者們不要就此止步，期待他們在不久的將來，還會對未盡的研究有所補足，還會有新的成果以饗讀者。

王 寧

2011年3月20日於北京師範大學

序 二

漢代揚雄所撰的比較方言詞彙集《方言》，作為世界語言學史上的第一部方言地理學專著，在人們越來越關注語言與文化研究的近現代，它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並備受關注，是理所當然的；而在上述研究成果中，近三十多年來最為引人矚目的，是華學誠教授的一系列論著。

記得五年前學誠教授離滬赴京的前夕，我忝為他的老友之一，無以為贈，只好謔了幾句韻文，題為《金縷曲·送別學誠教授》，有云：“揚子《方言》入新史，百載名家相續，算今日，惟君精出。此去悠悠千萬里，更揚旌縱馬馳平綠，送君去，歌一曲。”那時，學誠教授在海內外獨樹一幟的兩部新著，是《漢語方言學史研究》和《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我相信，凡是讀過這兩部在深入研究揚雄《方言》的基礎上撰就的漢語史新著的朋友，都不至於認為“精出”的說法是一種誇張。

學誠教授到北京不久，就寄來了中華書局出版的另一部新著《揚雄方言校釋匯證》。面對這部著重從文獻學角度研究《方言》的里程碑式的巨著，我不揣固陋，以《〈方言〉最新最好的校釋本》為題，發表了一篇讀書筆記，文末云：“我作為對漢語方言史興趣很濃的讀者，僅僅讀一部《方言》的最新校釋本不可能十分滿足；好在手邊還有《漢語方言學史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年版）和《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可供參考，前者是宏觀方言學史專題研究成果，後者是該學科第一部斷代方言學史；這兩部好書也是學誠教授的力作，跟《匯證》前後輝映，以立體三角之勢呈現於方言研究的學術前沿。想到上述一系列著作使我獲益良多，特就此

機會一併向作者致謝。”後來，聽說《揚雄方言校釋匯證》一書榮獲“王力語言學獎一等獎”，頓時想起了“實至名歸”這個成語，自幸筆記中所謂三書“呈現於方言研究的學術前沿”的說法並非謬譽。

最近，學誠教授又寄來了他所主編的《〈方言〉與兩漢語言研究叢書》書稿，這不僅讓我有了先讀的快樂，還使我在拜讀《叢書》的過程中，時時想起上述舊事——就我而言，這是一種非常愉快的回憶。

《叢書》體大思精，內容豐富。其中不少專書的初稿，我早先雖然讀過，但這次收入《叢書》前，作者對舊稿均做了大幅度的修訂，這一系列學術品質很高的新著，凸顯了系統研究和深度分析的特點。不難看出，主編和作者們多年來在《方言》研究理念和方法的把握上始終站在學術界的前沿，其學風之篤實，態度之謹嚴，在《叢書》中有充分的體現。我覺得，《叢書》中折射出來的科研精神令人感佩。

《叢書》就要出版了，我向主編和作者們致以衷心的祝賀。

吳金華

2011年5月16日於復旦大學

序 三

作為課題負責人和這套叢書的主編，為這套叢書撰寫序言當屬義不容辭。

我必須首先特別鄭重地向敬愛的王寧先生和吳金華先生致以誠摯的感謝和深深的敬意。1987年仲夏，我遵劉君惠先生之命至王寧先生府上求教而得親炙，自此而後，我的研究、我的工作一直得到王寧先生的關心和幫助。碩士論文完成後是王寧先生和周祖謨先生進行的書面評審，我所做的揚雄《方言》研究也一直在王先生關注下進行，《揚雄方言校釋匯證》正是經由王寧先生和魯國堯先生的推薦而最終獲得第十二屆王力語言學獎一等獎的。我到北京工作之後，王先生更是給予了全方位的寶貴支持，包括課題申請和這套叢書的完成。20世紀90年代初拜識吳金華先生，二十多年來我和吳先生相處在亦師亦友之間，並讓吳先生為我的事情費神不少。我申請江蘇省首屆高級職稱破格並獲得通過，事後得知主審專家正是吳金華先生；吳先生是我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委員，因而正式成了我的座師；我在上海培養的博士也都是請吳先生主持的答辯，這些博士正是這套叢書的主要作者。所以，當這套叢書基本完成並開始申請鑒定、交付出版時，我立即想到的是，向王先生和吳先生匯報並請求賜序，兩位先生在極為繁忙的情況下慨然允諾，並按照出版社的時間要求完成了序文的撰寫，這讓我十分感動，我相信，這套叢書的所有作者也一定會和我一樣深深地感謝二位先生。

下面簡要交待一下課題和叢書的緣起。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我開始做揚雄《方言》研究，其後逐步形成了一個系列研究計劃。這個計劃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對歷代注家進行研究，完成《方言》研究成果的總

結，為今後《方言》的利用和進一步探討提供新的基礎。二是用現代語言學理論的眼光、從學術史出發，對揚雄《方言》的用字、詞彙以及揚雄在詞彙研究上的貢獻，作出全面系統的探討，把揚雄《方言》研究推向深入。三是結合《方言》和揚雄的其他作品，展開對漢代方音、文字、詞彙、語法的研究，為漢語史的斷代研究和歷史分期提供參考。四是把揚雄《方言》的詞彙納入詞彙史、方言史進行考察，由此探求漢代方言詞彙的傳承、演變及其規律，包括方言詞彙在發展過程中與通語詞彙交互影響的規律。

隨着研究的深入，我發現這個計劃確實過於龐大了，僅憑自己的力量根本無法完成。2003年第一屆博士研究生進門之後，我就有意識地引導對此有興趣的年輕朋友加入到這個計劃中來，友生王彩琴、馬蓮、路廣、謝榮娥、王智群和博士後魏兆惠先後確定了與此相關的論題。2007年我以《揚雄〈方言〉與漢語史研究》為題，申請高等學校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專項基金項目第二期，獲准立項（課題批准號：200710）；經過兩年的努力，基本研究任務初步完成，2008年以《〈方言〉與兩漢語言研究》為題，申請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後期資助項目，獲得批准並擢為重大項目（項目批准號：08JHQ0001）。吳吉煌博士的研究正好與我的構想契合，很榮幸他願意加入這一計劃，並且得到他導師李運富教授的全力支持。經過課題組同仁兩年多的進一步努力，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套叢書就是上述兩個課題的成果。

現在重點介紹叢書本身。先介紹這套叢書的基本內容。

這套研究叢書，加上已經在2006年出版的拙著《揚雄方言校釋匯證》，實際上主要體現的是上述研究計劃的前三個方面。納入這套研究叢書的八種專著，可以劃分為兩個子系列，即《方言》研究系列，和與《方言》相關的漢語史研究系列。

《方言》研究系列在本叢書中有四部著作，即《揚雄〈方言〉校釋論稿》、《揚雄〈方言〉用字研究》、《〈方言〉與揚雄詞彙學》和《兩漢方言詞研究》。

歷代注家對《方言》的研究主要是從微觀層面展開的，其具體成果已經在《揚雄方言校釋匯證》中得到基本總結，但是有關《方言》的歷代整理與研究情況，以及前人整理與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成就與不足，還需要從學術史的角度進行系統分析、科學概括，拙著《揚雄〈方言〉校釋論稿》所承擔的正是這一任務。全書以揚雄《方言》的語言學史地位為基點，以綜論與專論相結合的方式展開評述，目的是為了全面、科學地呈現出《方言》歷代研究的面貌，為《方言》的後續研究提供基礎。

《方言》的文字，除了歷來陳陳相因的“多奇字”一說之外，並沒有見到全面、具

體、深入的研究，我曾經發表過《〈方言〉“奇字”考》一文，也僅僅是就其中“不見之奇”的文字做了初步考察。王彩琴博士的《揚雄〈方言〉用字研究》對記錄被釋詞語和解釋詞語的全部用字進行計量分析，對《方言》被釋語用字的情況進行窮盡考察，對表義字的表詞情況和詞彙特點、對記音字的表詞情況和詞彙特點進行分類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對《方言》用字的規律、“奇字”的具體所指，以及《說文》不收的《方言》用字的特點進行總結，試圖全面而科學地解釋《方言》“奇字”。

揚雄撰寫《方言》有沒有理論，他的理論都有哪些具體內容，在《方言》一書中是如何體現的，王智群博士的《〈方言〉與揚雄詞彙學》圍繞這一核心問題展開研究。她首先貫通了《方言》全書的條例，並以此為基礎展開研究；她發現了揚雄以“聚合”方式組織詞彙的特點，揭示了揚雄“別國方言”、“古今語”和“轉語”的深刻內涵，提出了揚雄文化詞彙學思想這一命題，從而具體證明了羅常培先生的論點：《方言》是“中國語言史上發達最早的詞彙學”。

《方言》中真正的方言詞彙有哪些，這些方言詞彙具有什麼特點，它們和通語詞彙之間有什麼樣的對應關係，等等，以往對這些問題沒有全面系統的科學報告。吳吉煌博士的《兩漢方言詞研究》針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同時參證《說文》材料，使我們得以在科學層面上看到了漢代方言詞彙的真實面貌：該著具體描寫了1 228個方言詞的地理分布和它們的意義範疇、詞性類別和音節結構，並深入考察了它們的歷史來源；以義位為單位整理出539組兩漢方言詞，討論了它們與通語詞之間的對應關係，揭示了同義異形對應詞的語音差異和語素差異；分析了12組同義對應方言詞在書面通語中的歷史發展，將兩漢秦晉方言詞與通語詞進行全面比較，探討了先秦兩漢通語基礎方言的變化。

與《方言》相關的漢語史研究系列在本叢書中也有四部著作，即《秦漢時期楚方言區文獻的語音研究》、《〈揚雄集〉詞彙研究》、《〈法言〉〈揚雄集〉詞類研究》和《兩漢語法比較研究》。

清代古音學在古方音研究上並沒有專門的成果，這一課題直到20世紀20年代以後纔得到重視，但是由於材料鑒別上不能令人滿意，因而所構建的楚方音音系或韻部系統都存在可信度到底有多大的質疑。謝榮娥博士的《秦漢時期楚方言區文獻的語音研究》採用“方言區域文獻研究法”，首先聯繫楚國疆域變遷直至滅國和同期移民的歷史，參考揚雄《方言》地理名詞並舉及方言詞彙情況，確定秦漢楚方言區的範圍，然後據此一一確認秦漢楚方言區文獻，搜集、鑒別、整理其中的語音資料，對其進行細緻描寫，通過共時與歷時的比較，探討調類、韻部、聲類問題，走出了一條研究秦漢古音可供借

鑒的新路子。

兩漢詞彙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材料的挖掘上尤其令人矚目，舉凡史乘、釋藏、諸子、詩文、小說、辭書、注釋、醫籍、金石磚瓦碑刻、出土文書等等都在利用之列，但是關於兩漢詞彙的分期歸屬，學界的看法並未統一。兩漢之交正是詞彙複音化加劇的時期，《揚雄集》是這一時期典雅書面語（即文言）詞彙系統的代表作品，儘管對現實語言的反映較為滯後，但漢代的新興成分却時有所見。馬蓮博士的《〈揚雄集〉詞彙研究》對《揚雄集》詞彙進行了詳盡的描寫和分析，對新詞新義做了積極的挖掘和分析，同時對成語和疑難詞語進行了考釋，從而據此揭示出兩漢之交文人書面語詞彙的基本面貌以及《揚雄集》詞彙在漢語複音化進程中的地位。

以往的兩漢語法研究較多地集中在虛詞、詞序語序、句式結構等三個方面，但是整體上來說，研究還不很充分。從所涉及的專題看，不少語法現象的研究不够深入；從所研究的範圍看，不少語法現象還沒有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從所使用的語料看，或者偏重於傳世文獻，或者祇採用出土文獻；等等。路廣博士的《〈法言〉〈揚雄集〉詞類研究》和魏兆惠博士的《兩漢語法比較研究》分別對詞類和以句法為核心的語法專題進行了研究，是兩漢語法研究的新收穫。路廣博士將揚雄的兩部著作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使不同風格特徵的語料相互補充，全面展現了兩漢之交文人作品的詞類面貌，為共時和歷時層面的漢語詞類研究提供可靠的參照，同時揭示出言文分離時期漢語詞類的一些特點。魏兆惠博士的研究不僅專門討論了《揚雄集》的語法特點，而且把視野放大到整個兩漢時期，針對兩漢時期有重大變化的語法專題，比如量詞、詞語附加現象、否定句、動趨結構、被動結構等展開專題研究，觀察和比較這一特定歷史時期上述語法現象所發生的各種變化，提出兩漢時期在漢語語法史上的具體歸屬；魏兆惠的研究在材料的選取上下了大力氣，她把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結合起來，綜合使用，增強語料的代表性、真實性和典型性，從而保證了所選語料能夠真實反映兩漢的語法面貌。

接着介紹這套叢書的特點。

這套叢書集中體現出來的特點有三個：一是重視突破，尤其重視難點的突破；二是重視材料，尤其重視第一手材料；三是重視方法，尤其重視方法的針對性。而最主要的特點則是，各部著作分則都可獨立，合則渾然一體。

《方言》歷代研究成果豐富，如何評價它們？還有哪些研究專題需要關注，或者有待深入？《揚雄〈方言〉校釋論稿》對歷代校注，包括成書的和沒有成書的條校條

釋，進行了逐一考察、全面研究，採用“總分總”相結合的結構，系統構建了《方言》研究史。《方言》有沒有詞彙學貢獻，都在哪些方面作出了貢獻？兩漢方言詞彙的面貌是什麼樣子，它與通語詞彙有什麼樣的對應關係？兩漢之交文人著作的詞彙具有什麼樣的特點，在詞彙史上處於什麼樣的地位？《〈方言〉與揚雄詞彙學》、《兩漢方言詞研究》、《〈揚雄集〉詞彙研究》在窮盡現有材料的基礎上，採用與所研究的問題相適應的研究方法，給出了嚴謹的答案。如何確定秦漢楚方言區及其文獻，如何正確提取出可供研究楚方音的有效材料？針對不理想不充分的有限材料如何展開研究，秦漢楚方音到底有哪些特點？《秦漢時期楚方言區文獻的語音研究》所進行的大膽探索和它的研究結論，無疑將會引起學界的重視。以往的兩漢語法研究雖然成果豐富，但是盲點不少，材料使用上也存在需要完善之處。《〈方言〉〈揚雄集〉詞類研究》採用封閉性材料，詳盡描寫，全面呈現了兩漢之交文人作品中詞類使用狀況，並對詞類系統本身提出了有價值的思考。《兩漢語法比較研究》則精選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代表性材料，採用專題比較研究方法，在兩漢內部又分成西漢、東漢兩個時間段，進行共時描寫和歷時比較，從而在共時的靜態的描寫和動態的歷時的比較中把握兩漢漢語的語法特徵，同時考察兩漢甚至上古和中古的相關語法點，以點帶面，提出兩漢時期在漢語語法史上的具體歸屬。《方言》“奇字”是千古懸疑，《揚雄〈方言〉用字研究》在逐字考察的基礎上提出了堅實可信的解釋。

由此可見，八本專著都有各自的研究任務和研究目標，但是作為一個課題，這套叢書又體現出整體性和系統性。整體性和系統性這一特點的主要表現是，該課題以兩漢之交的專人作品為基礎材料，以兩漢語言文字作為研究對象，融時點描寫與歷史考察、專題研究與整體研究於一體，從而探索《方言》與兩漢時期語言文字的特點和分期屬性。這一研究框架的設計，避免了祇根據單一時點、單一材料進行漢語史定性的習慣做法，而強調以某時點代表性人物的全部作品作為基本材料，同時強調結合重要專題進行歷史比較；這一研究框架的設計，擺脫了單純從語音、詞彙、語法等某一個方面，甚至其中某一個或某幾個小專題進行研究而定性的方法，而強調語音、詞彙、語法研究的綜合參證，強調採用多個重要專題與時點專人語料整體研究相結合的方法；這個研究框架的設計，還強調時點與時段的結合，本叢書中的語法研究專著對此體現得最為充分，它不僅重視兩漢前後兩個階段的歷史比較，還非常重視兩漢時段內各階段的歷史比較，從而試圖描寫出兩漢期間漢語語法各個方面的具體歷時演變，為最後確定兩漢語言特點和歷史性質提供可靠依據。

還應該說明我所做的工作與所應承擔的責任。

除了吳吉煌博士之外，其他各位作者與我都有師生之誼。很榮幸的是，包括吳吉煌博士，課題組各位的研究我都曾有機會最早貢獻了意見，包括研究課題的確定，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的選擇，直至論著大綱的形成，以及博士論文的審讀。各位的研究納入我所主持的課題之後，我又有機會和各位進行了更多更充分的交流，大到全書結構的調整，有關章節內容的安排，小到具體材料的取捨，相關段落的文字表述。除了魏兆惠的著作之外，其他書稿在出版前我又再次通讀過至少一遍，提出了一些具體的修訂意見，部分書稿還逐字逐句作了修改。總之，對這兩個課題和作為其成果的這套叢書，我盡心盡力履行了課題負責人和主編的職責。但是，各部著作所取得的成果則完全歸功於各位作者的努力，是他們為這門學科作出的貢獻，至於這部叢書中所存在的不足和問題，則主要應由我來負責，不僅整體架構是否科學我責無旁貸，即使是各部著作中的具體問題和錯誤我也應承擔識斷不高和審改不嚴的責任。

最後，但並不是可有可無的幾句話。

這兩個課題和作為其成果的這套叢書的完成和出版，令我感到無比欣慰，因為這表明距離我那個系列研究計劃的最終完成又大大前進了一步。衷心希望這套叢書的出版能夠有利於促進《方言》的深入研究和利用《方言》對漢語史展開多方面的研究，能夠有利於人們科學認識兩漢方音、詞彙和語法的面貌，並能為科學確定兩漢時期的漢語史歸屬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參考，還希望能夠有利於深入瞭解《方言》用字現象和漢代的方言俗字現象。

有機會和這些年輕學者在六七年時間內一起關注同一個課題，並在交流與合作中享受着快樂與友誼，於我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緣分，十分珍惜。衷心感謝這些年輕學者——我的朋友，衷心希望他們不斷有新的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問世。

各位作者陸續把書稿集中到我這裏之後，魏兆惠博士帶領在讀博士研究生張可和碩士研究生肖衛華完成了體例統一的繁瑣工作，為了一個可疑的腳注，他們都會仔細查核，叢書體例最後由張可總成，所以她用力尤多，貢獻最大。特記於此，並代表課題組向他們表示衷心感謝。

這套叢書與我最初的設想還有些差距，叢書中的問題和錯誤更是在所難免。為了我們共同的學術事業，也為了我們這個學術團隊的進步，衷心期待學界同仁不吝批評與指正。

衷心感謝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楊亞鴻老師，正是有了她持續不斷的督促，這套叢書才

能按期完成，並及時交到出版社。衷心感謝這套叢書的責任編輯王麗女士，她的專業水平令人敬佩，她的敬業精神令人感動。這套叢書能够以現在這樣的質量與品相呈現在讀者面前，從某種意義上說，王麗女士所付出的努力比叢書中任何一位作者都重要得多。

再一次謹以我個人的名義，並代表這套叢書的所有作者，向王寧先生、吳金華先生和楊亞鴻老師、王麗女士表示最誠摯的謝忱！

華學誠

2011年5月16日於北京語言大學